

日語難嗎？

——以近代初識日語的中國人為說

沈 國 威

Is Japanese Difficult?

SHEN Guowei

After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1894-1895), Chinese began learning Japa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y were motivated to learn Japanese in order to absorb new Western knowledge through Japanese books. They also felt that Japanese was easier to learn than Western languages.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Chinese perceptions and knowledge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at the time by focusing on the statements of Kang Youwei and Liang Qichao on the simplicity of Japanese. It will also delineate some aspects of Japa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引言：外語的難與易

日語難嗎？這一設問還暗含著與其他外語的比較。當日語僅僅被認為是一種方言時，自然要比掌握一種外語容易；即使被當作是“外國語”，其難易程度一般被認為與母語、外語兩者之間的相似程度有關。在19、20世紀之交，人們認為中日同文，正是這個理由，日語成為遠比英文簡單的一種“外國語”。19世紀中葉以後，在中國各大商埠西人開辦的新式學校學校越來越多，那裡的外英語教育為畢業生提供了一個找到一份好差事的保障；而日語在19世紀既不被認為是商業的語言，也不是學術的語言。但是甲午之後情況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日語突然成為間接地吸取新知識的工具，時代要求日語必須是一種可以在短時間內掌握的語言。因此日語難易的議論也就不單純是外語學習的問題了，而具有民眾動員的社會意義。本文通過對那個時代的日語學習材料的分析，考察當時人們所具有的日語觀，以及對以後日語教育的影響。

一 初識日語

中國的典籍最早對日語作記錄的是宋人羅大經著的《鶴林玉露》，其後至19世紀中葉，間有一些片斷的記載¹⁾。明治維新以後，中國的官吏、商人，及曾在中國居住過的傳教士等進入日本，首次實際接觸到日語，併留下了關於日語的觀感，如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傅雲龍、葉慶頤、黃慶澄等。實際情況與“中東同文”的預期相差甚遠，何如璋遂有“日本文字顛倒，意義乖舛”²⁾“方言殊異，文義支離，繙譯通事，頗難其人”³⁾的感歎。而他們的詩文中更多地記錄了日語之怪，即用漢語知識無法理解的日語⁴⁾。葉慶頤則在“事物之名於異域固不必從同，第日本與我國有同文而殊解者”和“日本與中國地同洲書同文，事物稱名應莫不從同”之間困惑⁵⁾。他把“同文殊解”的原因歸結為“鑄鳴伏獵”，以訛傳訛。最早把日語作為一種外語從語音、文字、詞彙、語法、文體等角度進行描述的是黃遵憲⁶⁾。儘管黃的著作中還有一些想當然的記述⁷⁾，但關於日語文字的記述（漢字的傳入，漢字傳入之前的日本神代文字）基本上反映了1880年前後日本國內日語研究的成果；黃對於日語的語言系統、詞彙、語法、文體等方面特徵的把握也極為準確。

但是黃遵憲的觀察並沒有成為中國社會的共同知識，中國人一直沒有把日語作為一種外語來看待。1862年開館的京師同文館開設十餘年沒有培養日語人才⁸⁾，以致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1877年只能帶英語翻譯赴任。到日本後發現語言不通，“只得暫覓通事二名”⁹⁾。第二任公使黎庶昌赴任後即以“使署理署需用東文繙譯”為由，提出“招致學生設館肆習”日文¹⁰⁾。公使館附設的東文館於光緒八年九月開辦，但是培養的情況似乎並不理想，翻譯人才短缺的情況甚至

1) 劉建雲，《中國人的日本語學習史——清末の東文学堂》學術出版2005年19~35頁

2) 《清季外交史料全書》(六)“使日何如璋等奏分設駐日本各埠理事折”，光緒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學苑出版社1999年版卷14，1020~1021頁。亦參見容應莫“戊戌維新與清末日本留學政策的成立”，收《戊戌維新與近代中國的改革——戊戌維新一百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王曉秋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311~327頁。

3) 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 日本日記等》岳麓書社1985年102頁

4) 參見沈國威“關於和文奇字解類資料”，《或問》第14期117~128頁

5) 沈國威，《近代中日語彙交流史》，笠間書院1994年92~108頁

6) 有關內容先在《日本雜事詩》中出現，較完整形式的記述是1895年《日本國志》刊行後才被廣泛閱讀。

7) 如認為某些詞彙取自遼人語；關於漢音、吳音等的記述《日本國志》和《日本雜事詩》之間也有變動。

8) 京師同文館於1897年才開設東文館，可以算是國內官方日語教育的開始。劉建雲前揭書79~87頁。許海華“近代中國日語教育之發端——同文館東文館”《日語學習與研究》2008年第1期52~58頁

9) 參見注2的文獻。“通事”一般指口語翻譯，書面語能力較差，所以有“只得”之說。

10)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在日所招東文學生畢業後應如何待遇片”光緒十年七月初五日。《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五卷

到了戊戌維新的前夕仍沒有得到改善¹¹⁾。

二 日語學習動機的轉變

如上所述，19世紀既不是商業語言，也不是學術語言的日語，學習動機相對軟弱。一方面明治維新以後兩國民人開始交通，時有訪問記出版。但無論數量還是內容深度都是日本入超中國。1854年王韜將錢蓮溪的琉球雜記“採摭概略，連綴成篇”刊載在《遐邇貫珍》（1854年6月號）上“以備遊人之考鏡”。1889年在上海刊行《策鰲雜摭》的葉慶頤記錄日語情況的動機也只想到了“俾問禁問俗者作權輿或不無小助”。

1884年玉燕出版《東語簡要》，某人寫序，對該書著述動機解釋如下：

竊以中外通商，迄今已久，初時不過英、法美諸國而已，繼以泰西各國來者益眾，輯睦愈敦。仰見我朝深仁厚澤，敷被遐荒，視中外如一體，足使海國臣民廣開見聞。近則東瀛步武泰西，亦於通商各埠駐設領事，而上海尤首屈一指。且日人于租界建房屋、創市肆，鱗次櫛比，即茶寮之增艷鬥麗，亦可謂酒天花國中，別樹一幟矣。惟我人之欲啜茗消愁者，苦於語言不通，徒呼負負，亦豈非一憾事乎。余友玉燕居士，取歷東瀛，于該國語言文字，靡不精通。茲因公允來滬，感時事之日新，嗤斯人之舌歧，爰將日本要語摘錄一編，付諸梨棗，以公同好。俾使中東人民和好益敦，懋遷益盛。

是書木刻，六十五丁。云“將日本要語摘錄一編”，其實不過是一些日常俗語，供嫖客在日本茶寮打情罵俏。1895年隨其父居留日本的陳天麒出版了《東語入門》，這可以說是當時惟一可供選擇的日語學習書¹²⁾，陳在自序中說：

自各國通商以來，我華人之攻讀英法諸文者，日甚一日，惟研究東學者寥寥。蓋亦苦于未得其門耳。（中略）余自乙酉年（1885），隨家大人使日本，舉業之暇，兼習東西語。在東京六年，該國語言文字略能會通一二，愧未博究其奧，詎敢自矜，有得出以問世。然既稍有所知，又烏敢私以自秘。況兩國近又修睦，增開商市。東人之來我華者愈多，貿易日盛而故無人焉。輯一書以啟後學，竊慮言語不通，情必扞格而易啟猜嫌。爰不揣淺陋，緝譯

11) 參見後文查雙綏致汪康年信。但許海華在前揭論文中說“至第三代駐日公使徐承祖任上，隨著東文學堂的學生畢業留館或被提拔為學習翻譯，日語翻譯不足的矛盾終于得到根本性的扭轉”。考慮到裕庚召募青年送公使館學日語一事，許的主張似有商榷餘地。

12) 實藤惠秀，《中国人の日本語研究》，國語文化講座6《國語進出篇》，朝日新聞社1942年274頁

是書，注以華音，既竣友人慫恿付印，因誌數語于簡端。

兩本書所設想的學習者都是中國國內的生活的人，就是說是為了與來到中國的日本人進行交流而學習日語。王韜為《東語入門》作序說：“近以日人通商蘇杭兩郡，效日東方言者頗眾，（中略）東語入門一書，為問道之津梁，舌人之木鐸，俾貿易場中通問答者作先路之導焉”。此時距離錢蓮溪的琉球雜記已經40餘年，日語除了“問禁問俗”以外又增加了貿易上的功能。

1900年首批留日學生戢翼翬刊行《東語正規》，編纂目的是“輸入文明之先導不得不求之于語學”，獲取西方文明知識成為學習日語的新動機。這一點反映在許多日語課本的序言中。以下是若干例子：

然則以個人之學問言不得不學日語，以世界之大勢言尤不得不學日語，至若兩國交際上之關係，更無論矣。

語言者，亦科學之媒介，藉以傳種，藉以播精，且藉以孕育者也。（日語用法彙編1905，畢祖誠，李文蔚），

間接輸入文明之導線。（日本俗語文典1905再版，吳初，孟先）

毫無疑問中國日語觀發生變化的契機是甲午戰敗。甲午之後，中國急需吸收西方新知識，學西文，譯西書短期內難於見效，遂將目光轉向了日本。康有為率先提出利用日本資源的問題，經張之洞（勸學篇）等推動，1897年時以後假道日本獲取新知識成為中國社會共識，出現了譯日本書、留學日本的熱潮。有可資利用的資源是譯日本書的理由之一，而更在於“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張之洞語）。康有為在《日本書目志》的自序中說：

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姑自維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藝已成。（中略）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變法之條理先後，則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為捷疾也。且日本文字猶吾文字也，但稍雜空海之伊呂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而要書畢集矣。

康有為在“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又說：

若因日本譯各書之成業，政法之成績，而妙用之，彼與我同文，則轉譯輯其成書，比其譯歐美之文，事一而功萬矣。

如此，日語與西文一樣可以成為汲取新知識的工具，而且比西文簡單，“事一而功萬”更是打動了不少人。“由東譯華，較譯自西文尤為便捷”的空氣瀰漫了全國¹³⁾，也給其後的日語學習加上了濃重的實用主義的色彩。

西文難不難？怎樣才能達到譯書的程度？馬建忠對傳教士采用的口述筆錄的翻譯方法提出尖銳批評的同時，馬建忠提議：選長於漢文，年近二十而天姿絕人者，（略）果能工課不輟，用志不紛，而又得諄諄善誘者之指示，不過二年，洋文即可通曉，然後肆力於翻譯，收效必速¹⁴⁾。二年即可通曉洋文，著手翻譯似過於樂觀，後來主張譯日本書的人如康有為則說學好西文非五六年不可。當然，對於康有為不管是西文，還是東文都沒有實質性的知識，僅道聽途說而已。

三 梁啟超與日語

從時間上看，第一次公開提出以譯日文書的方式引進西方新知識建議的應該是梁啟超。1897年7月，梁啟超在刊登在《時務報》上的“譯書”一文的末尾寫道：

日本與我為同文之國。自昔行用漢文。自和文肇興。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與漢文相雜廁。然漢文猶居十六七。日本自維新以後。銳意西學。所繙彼中之書。要者略備。其本國新著之書。亦多可觀。今誠能習日文以譯日書。用力甚少。而獲益甚鉅¹⁵⁾。

在同一篇文章中梁啟超還提到了學習日文較易的五個理由：

計日文之易成，約有數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無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闊，三也，名物象事，多與中土相同，四也，漢文居十六七，五也，故黃君公度謂可不學而能，苟能強記半歲，無不盡通者，以此視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

黃遵憲曾說過“日本之語言，其音少”，在夾註中又說“土音只有四十七音，四十七音又不出支微歌麻四韻”。梁啟超的第一、二項來自黃遵憲應無疑問。第四、五項雖然《日本國志》中沒有具體的敘述，受教於黃是可能的（但黃說市井塵細民用方言十之九用漢語亦十之一，並沒有漢文十六七的說法）。惟不知第三項“文法疏闊”系何所指，來自何處。此時作為

13) “改譯書局為譯書官局摺”《中國近代出版史料補編》，張靜廬輯注，中華書局1958年51頁

14) “擬設繙譯書院議”《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張靜廬輯注，上雜出版社1953年29～34頁。

15) 《時務報》1897年第27，29，33期。收入《飲冰室文集》時改題為“論譯書”。

grammar義的“文法”概念並不普及，其他同時代的文獻中也沒有介紹日語文法的文字。筆者認為梁啟超關於日語的知識應該有古城貞吉的貢獻，兩人在《時務報》期間有實際的接觸。

日語也許真的易學，但是並不一定容易翻譯。黃遵憲就指出過，日語與漢語“字同而聲異，語同而讀異，文同而義異，故求譯其文亦難”¹⁶⁾。日本公使館的查雙綏也告訴汪康年日語甚至比西語難翻譯：

曠代物色翻譯一節，我國通中西文者，尚不乏人，（上海一區，不難物色）通中東文者，實不易覓。（署內東文翻譯已不敷用。）刻下略通東文諸君，或在總署，或辦交涉事宜，在中國者無論矣。此間能通東語者尚夥，精者亦不過四五人，而能通東文者無人焉。（東文較西文即難，若翻譯法律諸則尤難。）¹⁷⁾

梁啟超曾為羅致翻譯人員費盡了心思而不果，所以1897年初康有為在桂林發起組織聖學會，連續致函梁啟超，商議在廣西設學、譯書、辦報、築路時，梁啟超回信對後三項表示反對：

日本書同文幾半，似易譯於西文，然自頃中國通倭文者不過數人。超以近日《時務報》《知新報》《農會報》所請日本翻譯艱難情形觀之，而知日本書之不易譯矣。今所最可恃者，謂速聘日人到澳，會同門人學習為翻譯書之用，然而超知其必不能成也。

儘管如此，日文書較西文書更易於翻譯成中文的言說被不斷地重複著，1898年康有為在代楊深秀上的奏片中直接向朝廷建議：

日本變法，已盡譯泰西精要之書，且文字與我同，但文法稍有顛倒，人人可為譯書之用矣¹⁸⁾。

16)《日本雜事詩》原本61的夾註。鍾叔河《日本雜事詩廣註》114頁。但在日本雜事詩定本、日本國志中都不再見這段記述。

17)汪康年著、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9）1277頁。

18)《戊戌變法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8年446頁。而在《戊戌奏稿》中則見：請在京師設譯書局，妙選通人主之，聽其延闕通學，專選日本政治之佳者，先分科程並譯之。不歲月後，日本佳書，可大略皆譯也。日本與我同文也，其變法至今三十年，凡歐美政治、文學、武備新識之佳書，咸譯矣。（中略）譯日本之書，為我文字者十之八，其成事至少，其費日無多也。

1898秋，戊戌維新失敗，梁啟超流亡日本，開始實際接觸日語。據說梁在日本的軍艦上已經開始閱讀漢文體的政治小說，到日本後又向萬木草堂時代的同學羅普學習日語。兩人合著的《和文漢讀法》反映了梁的學習過程。這些都發生在梁抵日後的短短的一段時間裡。梁發表“論學日本文之益”，第一次提出了“待譯而讀之緩而少，不若學文而讀之速而多”的主張。號召人們直接學日文，讀原書。這是可以理解的，儘管日語易學，但譯成中文總要多一道手續，不如直接讀原書。而之所以能不譯而讀都是因為日語易學。梁啟超在文章中繼續說“學日本文者，數日而小成，數月而大成”。為什麼易學？梁說“日本文漢字居十之七八，其專用假名不用漢字者，惟脈絡詞及語助詞等耳。其文法常以實字在句首，虛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顛倒讀之，將其脈絡詞語助詞之通行者，標而出之，習視之而熟記之。則可讀書而無窒闕矣”¹⁹。與一年前的《譯書》相比，梁對日語的理解有了飛躍，這應該是羅普的功勞。實際上，“論學日本文之益”中的論述可以在《和文漢讀法》中找到原型。

但是，梁啟超的易學說是有條件的。一是只讀，即目治，聽說與寫另當別論；二是須通漢文。“若未通漢文而學和文，其勢必顛倒錯雜，沓亂而兩無所成”。那些學了幾年還不通者都是因為漢文不好。需要指出的是，梁意識到了“聽、說、讀、寫”的區別，但是對同樣是書面語也有不同文體的區別這一點梁啟超似乎沒有意識到²⁰。所謂“易”的是那些漢文體的文章。

四 《和文漢讀法》的功罪

梁啟超的《和文漢讀法》影響極大，獲得了全國性的支持²¹。為《和文釋例》（1901）作序的邢之襄寫到：

日本與歐洲文字絕異，猶不避勞瘁孜孜其業如此，而我國之文字，與日本為同源，乃置之不顧，必藉二三譯言者之力，始可以涉獵其書，抑可異矣。

無疑這是梁的不譯而讀的主張。著者吳啟孫則說得更清楚：

19) 關於梁啟超的和文漢讀法，劉建雲指出蔡元培在京師同文館裡就已經實踐過。劉建雲前揭書242頁。

20) 黃說“(維新以後的日本職制章程條教號令……)概用和文[即日本文以漢字及日本字聯綴而成者也]”是第一個明確地將日語當作外語的記述，同時也指出了日語的不同文體。《日本國志》凡例，括號中為雙行夾注。在傅雲龍等人的報告書中均將日語稱為“方言”

21) 關於《和文漢讀法》請參見沈國威編著《漢字文化圈諸言語的近代語彙的形成——創出と共有》，関西大学出版部中收錄的陳力衛論文。

今謀新之士輒曰，淪民智莫急於譯書，而從東文轉譯西書，尤為事半功倍。斯說也，余以為不然。夫西書當譯，東書不當譯。何則？東土文字盡與吾同，其所異者，不過數十虛字之間耳。得其鉤勒聯貫之法，循而讀之，與漢文無以異也。

吳啟孫對東文轉譯西書事半功倍的說法不以為然，既然學日語“穎者數日，鈍者旬月，可以盡通”，就不需要勞動翻譯了。當然吳啟孫本人精通日語並沒有花費太多的時間，他的《和文釋例》則似乎是為了驗證和文漢讀法的有效性而寫的，因此例舉也只能都是漢文體的文章。這樣的文章記得再多對吸收新知識也不會有幫助。另一個日語易學說的支持者是在中國國內的學習環境中短時期內掌握了日語的丁福保。

丁福保1901年考入盛宣懷在上海創辦的東文學堂學習日語。他本人在東文學堂學習不足一年（其中有半年回老家養病），卻學有所成，是眾多日語教科書著者中惟一（？）沒有去日本留學過的人。他先著《東文典問答》（1901）²²，又著《廣和文漢讀法》（1902）。丁福保在“東文典問答序”中說：

今歲冬季。陽湖吳稚暉先生自日本赴粵東。道經滬上。謂余曰。東文文法。其緊要處全在動詞助動詞及助詞等。如盡力教人。六七日間。無不通曉者。嗣後即可將普通東文書。隨閱隨查。一月小成。三月業大就。子盍不將文法編成淺說。以餉吾黨之好學者。

可知本書編纂是受到了吳稚暉的影響。吳稚暉1901年春赴日留學，是年冬回國。短短的幾個月，學得頗有心得。丁在“東文提要”卷首又寫到：

或謂學日本文。數日可小成。此言誠非誣也。茲將東文中緊要字句。錄成四十一款。倘能依次熟記。即可當數日之小成矣。

《東文典問答》卷末所附的“東文雜記”是丁福保剛剛開始學習日語不久時留下的文字，記錄了對日語特點的觀察和學習心得。雜記開頭丁全文引用了梁啟超的“論學日本文之益”，表明了他對梁啟超的贊同。丁還談到了日語的文體以及日本實際的語言生活現狀。丁寫到：

22) 內田慶市教授架藏的文明書局1902年版卷首有：是書辛丑冬初用寫真石版印刷五千部至秋間（應為壬寅秋——筆者）銷售已罄購索者日有數十至茲重為修正改良徇文明書局之請編入普通教科問答（下略）的說明。這個修正版另附有“東文雜記”[辛丑十二月]“東文提要”[壬寅夏日]。

東文與東語，其同者十七八，不同者十二三。

閱東文書，其難易約分三大類。一即中古文（上古文更當別論）此猶乎周秦至唐宋之散文也。其文法略有與今違異者，此難讀者也。然和文之根柢在焉。一俗文，小學讀本之首數冊及小說是也，此難讀者也（中間半文半話書簡文亦同）。如不通此，則通俗應酬文，無以讀也。一即普通文，幸而講學文之書，十八九用此文。此文在彼國為難，因漢文多也。至我國人讀之則反之。故不欲入三島相交接，因陋就簡，通普通文亦可矣。吾所答問者，即注意於此。然苟通普通文，因而以普通文，進讀中世文及俗文，亦如舟之有楫，如車之有輪，不難計日可達也。況其間之階級，自當先普通文，其文之有用，亦當讓普通文（報中字兼有三體文故全報紙或則全能解釋或則全不能通即此之故）。習普通文，愚者三月成，習俗文及話，必一年。非其詞法之難通也。普通文者，每篇之字，素識者十七八。俗文之字，識者不能十四五。文法最易，惟識字最難。聰強之壯年人，一日能記二十字，中數也。積一年方得數千字，乃可通素不通之十六七。西文與東文之難易，亦即在此。習中世文，三月亦可通其法。（東文雜記78下～79上）

《東文典問答》出版後不到一年，丁福保又出版了一本日語學習教材，名之為《廣和文漢讀法》。石印部份83頁。儘管丁福保在本書的卷首再次刊載了梁啟超的“論學日本文之益”（活字印，其後附有“東語語法略說”3頁，作於1901年冬），但此時，丁氏似對日語有了更多的了解。本書詳細介紹論述了詞類、用言的活用、格助詞、語法成分以及造句法。本書取名《廣和文漢讀法》，但是舉例都是和文漢讀法束手無策的普通和文，即“漢字かな混じり文”，所以另有一書名：普通東文速成法。這樣的普通和文令丁福保對和文漢讀法的效用產生了疑慮，說“和文惡可漢讀哉，所謂漢讀者，人云亦云耳”。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採用這個書名？丁福保的解釋是：“書名，書之記號也。取本有之名而名之，因其記號之熟也。此是書之所以名《廣和文漢讀法》也”。就是說，既有商業上的考慮，也有對梁崇拜的因素。

一些教科書開始注意問題學習的難易的影響，如《和文讀本入門》（1908）緒言說：

和文有文語體白話體之別。白話體不獨用之談話。即書報中用者亦不少。此二者中。在中國人。以學文語體為易固矣。至如何始能分別二者而教之。則頗為一難問題。編者徵之實際之經驗。深知初學時二者併教之不可。故本書先使其知組織文語之大體法則。然後再及白話。此亦編者苦心所在也。

對於所謂的和文漢讀學習法，當時的日語界是毀譽參半。《中日文通》（1905）的著者張鴻

藻說：

非取我國文字顛倒轉用，而成此簡單不備之國語，（中略）讀漢語而舍其虛字，欲速者終歸於不達。

《日語教程》（1906）的著者湘漁也說：

數年前，吾國識者多倡導和文漢讀之法，其意非不善，其法多不行，蓋僅呆記若干之助詞、助動詞而不究其根源，一遇變化則成食古，勢必牽強附會，思索甚苦而謬誤極多。然則“和文漢讀法”者，以己之意思，強解和文，非真能讀和文也。

但是，《日本文法輯要》（商務印書館1933）則表示推崇：

吾人之讀日本文者，決無須以日本人之讀法讀之，盡可依吾國之讀法，顛倒其詞句，刪去其語尾，改變其助詞，謂之‘漢讀法’……或以此種讀法為求速成者之所臆造；然予則極贊成此種讀法，以為便利而且正當。

本書出版於“國難”之後，徑將日語稱為“方言”說：

吾人對於日本文，不可認為外國文，當視為漢文之一種，即漢文之雜有日本方俗言語者。吾國文字，雜入方俗言語者甚多，即經史中亦屢見之。佛書中之梵語，元史中之蒙古語，尤連篇累牘，讀其文者，若不理解其方俗言語，則文義亦不易了解，但吾人固不因其雜有方俗言語，而不認為國文。日本通用漢文，為吾同文之國；惟於漢文中雜有假名以記其方俗言語。吾人苟稍加研究，識其假名，治其文法，則理解其文字，較之讀佛書與元史，猶易易焉。

小結：日語難在哪裡？

對於世紀初的學習者，日語難嗎？難在哪裡？漢語是沒有形態變化的語言，所以學習日語的人首先對日語用言的形態變化，即活用感到困惑。薛琛在《東語語法提綱》（1900）中說：

忽而マス，忽而デス，忽而デアリマス，忽而マシタ，忽而マセウ，忽而キル，忽而エ

ル，忽而オモフ，忽而オモヒマス，忽而ドコ，忽而ゴザリマス，忽而ゴザイマス，又有ク変キ，キ变イ，ム、ブ、ニ字变为ミ、ビ、ニ字，或又变为ン。此種詞滿紙皆是，安得不目迷五色，灰心而短氣也。

和文漢讀法讓人忽視那些變化詞尾，但這只能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廖宇春則認為：

東文辨名詞易，識虛字難，倘虛字之上雜以東文疑難閃爍之名詞，而初學往往索解不得。……日文最難辨別者，靜助詞、動詞、助動詞耳。《東文新法會通》（1902）

編寫了《日本語言文字指南》（1902）的王鴻年也認為這些擔負著語法功能的成份是學好日語的關鍵，他說日語：

字體錯雜，文辭顛倒，學者苦之，於是又有望洋而嘆之感。此無他，不知其文法，故不解其趣旨，譬之入室者，必由於門，東學為室，東文為門，不得其門，則不能入其室也。況其意義錯綜、變化萬殊，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日語的另一個難點是漢字的複雜的讀音。戢翼翬在《東語正規》序言中說“日本所用漢字雖同音之字字母均有一定音法其法繁雜非鑽研日久未易辨識”，是具有代表性的。黃遵憲所說的日語與漢語“字同而聲異，語同而讀異，文同而義異”則是所有踏上日本，接觸滿目的日本漢字的中國人的共同觀感。這種被稱為奇字的日語漢字用法催生了多種“奇字解”類的教材。著《日語奇字例解》（1905）沈晉康說：

讀日語不難難於識奇字，如[矢釜シイ、間拔野郎、勝手氣盡]等字，苟不下以註解，無論何人，末（原文如此）有善悟之者也。今年以來，日語課本其稍有價值，為學界所贊許亦不下十數種。然未有涉及是問題者。間有之亦隔靴搔癢，未能驟悟。

《東語異同辨》（1905）的著者張毓靈也說：

余自庚子春抵東京學日語，歷寒暑四五度，經師友數十人，始獲稍窺門徑，其難可知矣，テニヲハ文法之難也，吳訓並用讀法之難也，半濁音不易發，暗字不可顯，此又口音之難也，

這是一本對日語中的同音異義詞進行辨析的工具書，主要解決口語中的同形異義、同音異義的問題，全書150頁。學日語僅四五年的作者編出這樣一本書已屬不易。同樣提到文言口語分離，口語難學的還有《日本俗語文典》（吳初等著，1905）：

口語者文字之母，文字者口語之化身也。然日本之語言文字，雖顯判兩途，要之不識其語言而欲明其文字者難矣。

伊澤修二在《東語真傳》（1903，泰東同文局撰）卷首的“弁言”中說：

凡學東語者。有三難。一熟習字母之難。二尋繹語法之難。三措辭支絀之難。欲通東語。非除三難不可。

即標準的日語發音、正確的句子結構、以及地道的日語表達方式的3個方面。為此，這本書使用羅馬字母標注假名的發音，對詞類、助詞的用法等語法項目也有較詳細的解釋。

總之，隨著《和文漢讀法》引起的日語熱逐漸降溫，人們逐漸認識到：儘管學習者的智力不同，資質各異，要想掌握一門外語都是不容易的。

附記：本文初校曾於2008年10月11日關西大學亞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CSAC）舉辦的國際研討會上宣讀。蒙與會學者惠賜寶貴意見，謹表感謝。另，本文執筆之際蒙內田慶市教授、李小蘭教授、孫青教授惠賜資料，謹致謝忱。

其他參考文獻：

- 李小蘭，清末日語教材之研究，碩士論文，2002年
 李小蘭，丁福保與日語教科書，日本思想文化研究，第7期2006年91-97頁
 劉建雲，《中國人的日本語學習史——清末の東文学堂》學術出版社2005年
 許海華，京師譯學館日文科之研究，日本思想文化研究，第9期2007年54-59頁
 許海華，近代中國日語教育之發端——同文館東文館，日語學習與研究，2008年第1期
 沈國威，時代的轉型與日本途徑，《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台灣聯經2007年241~270頁
 陳力衛，梁啟超の『和文漢讀法』とその「和漢異義字」について——『言海』との接点を中心に，《漢字文化圈諸言語の近代語彙の形成——創出と共有》關西大學出版部2008年423~462頁
 纂輯 日本譯語 京都大学文学部国語学国文学研究室編 京都大学国文学会1968年